

上海禁娼與在華西人的道德焦慮 ——以上海進德會為中心的觀察(1918-1924)

胡成*

1918年至1924年，上海公共租界以西人基督教和道德改良人士為主成立了進德會，發起為遏阻性病蔓延並改良上海道德風化的禁娼宣傳運動，終而迫使工部局不得不宣布以五年為期廢絕娼妓。本文以進德會為中心，探究這些外人道德改良者致力於拯救華人墮落的靈魂，力圖通過傳播基督教教義和西方文明來改造中國，故不同於工部局或一般西人將租界禁娼限於公共衛生和社會治安方面的考量，更為關注改善外人社區的道德風化和解救白人妓女，以便更有效地對華人進行道德示範和宗教拯救。然而，長期以來讓他們感到痛心疾首的，是上海租界存在眾多西人性病患者和白人妓女，致使基督精神和西方文明在華人面前威嚴掃地，並成為其內心深處難以抹去的道德焦慮。在這個意義上，發生在此時上海租界的禁娼，就不只是一個外人市政當局和道德改良人士單方面、或單向度對中國社會進行現代性改造和靈魂拯救的故事，且也事關當地華人社會／外人社區就兩性關係意義上爭辯到底誰的文化或文明係屬莊重／放縱、純淨／淫蕩的相互道德認知和文化想像。這是否也可視為西方人在所謂「外人冒險家樂園」的上海、乃至半殖民地的中國，所承受的另一種的「白人的負擔」？

關鍵詞：上海公共租界 禁娼 進德會 在華西人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緒論

1920年5月13日，上海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按照納稅人會議通過的廢娼決議，發布通告宣稱對界內妓院進行登記註冊，決定以抽籤形式，五年為期吊銷妓院營業執照，以求徹底禁絕涉及賣淫等「商業性惡行」(commercialized vice)，這也是在近代中國境內首次採行的大規模禁娼。就此研究的相關學術史發展來看，自1990年代以來，歐美學術在「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和後現代、後殖民地和性別研究的影響之下，性病、妓女被視為現代性的重要隱喻(metaphors of modernity)，受到了學術界高度關注。¹與之相應，1990年代以來，法國學者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美國學者賀蕭(Gail B. Hershatter)，分別從制度設置、性別建構及性病控制等角度，重點討論了工部局的禁娼措施、巡捕執法、娼寮營運方式和妓女的社會構成等相關問題。香港學者程愷禮(Kerrie L. MacPherson)則從性病與帝國關係的角度，探討了1920年12月至1921年1月，英國皇家防治性病委員會(Britain's National Council for Combating Venereal Disease, NCCVD)的遠東分會(Far Eastern Commission)的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之行。²然而，問題還在於禁娼運動此時早已

¹ Timothy J. Gilfoyle, "Prostitutes in History: From Parables of Pornography to Metaphors of Modernity," pp. 117-141.

² Christian Henriot, *Prostitution in Shanghai, A Social History* (中譯本：安克強著，袁燮銘、夏俊霞譯，《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Gail B.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20th-Century Shanghai* (中譯本：賀蕭著，韓敏中、盛甯譯《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Kerrie L. MacPherson, "Health and Empire: Britain's National Campaign to Combat Venereal Disease in Shanghai,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風行歐美諸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各國為防止數以百萬計的士兵傳染性病，又都加強了對妓女的查禁和性病的控制力度，如果禁娼措施在各個世界性都市中大同小異，妓女又都是社會最底層和最貧窮之人，那麼此次上海的禁娼又有什麼樣的特殊性？

不同於此時其他的世界性大都市，如紐約、巴黎、倫敦和柏林，上海的特殊性是作為一個東方的半殖民地社會，有眾多外國公司、銀行、商鋪、報紙、教堂，彙聚了近三萬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商人、官員、職員、醫生、記者和傳教士，每天還要接納登岸觀光、休閒的近六千多名外國商輪、軍艦的水手和水兵。就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華人民族主義之間的緊張和對立來看，1906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了一位上海白人的誇耀之詞，說他喜歡上海，醉心於驅使當地華人苦力和僕人，使之永遠惟命是從，並說自己願意生活在「這座不到一萬名白人用智慧和勇氣統治百萬中國佬(by force of brains and courage rule a million Chinamen)的城市。」³的確，在當時中國不完全的市政主權管轄之下，租界那些攫有經濟、政治、文化支配權和控制權的白人，其中不乏一批飛揚跋扈、不可一世之人，自以為能夠隨心所欲地凌駕於當地華人之上；再加上一些處在社會底層的外國冒險家、水手和白人妓女，沒有太多母國文化和家庭的道德約束，為了發財和生存而肆無忌憚、不擇手段。在此次禁娼運動中，一位積極鼓吹淨化租界道德風氣的改良人士就曾憤怒地指出：「上海的獨特環境不僅充分地暴露了華人性格中十分惡劣的一面，且也聚集了大量通曉多種語言、品行更為惡劣的一幫外國人。」⁴

³ Capt. Champers, Andrews, "On the Slopes of an International Volcano," *New York Times*, 11 November 1906.

⁴ Denton, "The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2 April 1919, pp. 102-103.

如果說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那麼自然可以理解上述那幾位學者的研究，或較多關注外人，如租界工部局頒布的各项禁娼措施；或較多關注當地華人，如中國妓女的性病及娼寮營運方式，更多講述的是外人與華人之間的禁娼故事，而沒有太多側重於上海作為中國最大通商口岸、遠東最繁華港口城市的世界性(cosmopolitan)和半殖民地性，致使一些與之相關的種族、性別、文化和文明衝突的歷史面相未被充分探討。就如即使聲稱歷史並非簡單地是一項「虛構的工作」的安克強，在其資料詳實的《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一書中的第11、12章，雖然集中論述了「疾病預防與道德規範(1860-1914)」、「上海的廢娼運動(1915-1925)」，內容卻也都是關於中國妓女，以及她們與外人市政當局和道德改良人士之間的互動，而沒有一段文字論及在上海的外人妓女、外人性病罹患者和外人社區的道德風化，與此次廢娼運動的關係。然而，正是由於這樣的一些缺失，以往研究也就未能有所區別地交待其時人們在談及「妓女」、「性病」、「道德規範」和「禁娼」時，經常隱含著一些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指向；再加上又都聲稱自己講述的是關於中國城市女性生活史和中國妓女史，這就很容易讓讀者誤以為此時的上海妓女、以及那些罹患性病和道德敗壞者都是華人，賣淫業的氾濫和猖獗也只是華人社會的問題，從而使得這些卓越的研究可能也會在思想史意義上自覺、或不自覺地重複了以往歐洲中心主義者最津津樂道的在華西人單方面、單向度地改造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老套故事。所以，在這樣一個被當時外人輿論也都認為自己僑民道德風化不佳的城市裡，此次禁娼運動與其社區有什麼樣的關係；或者說這些外人主持者或鼓吹者究竟要控制誰的性病、拯救哪些妓女、純淨誰的道德，就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重要的是，此次禁娼雖事關性病預防、道德改良，在當時的上海卻不同於此前、或同時期歐美社會展開的禁娼運動，既不只限於疾

病、醫療的公共衛生事務或市政改革，也不僅涉及女權運動和社會風氣純淨；且還涉及在道德層面上其時上海的華人社會 / 外人社區，以及中外、東西兩個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間的相互認知和相互定義。在歐美社會的情況是，隨著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優生學說的風行和種族主義的興起，性病儘管在當時只是梅毒、淋病，但已不同於肆虐人類的其他傳染病(如鼠疫、霍亂、肺結核)，罹患者或可被視為個人的不幸，有可能受到他人的同情和憐憫，其時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早已將性病視為個人的懶散、懈怠、放縱和不潔所致，是對「惡習的報應」(retributive accompaniments of vice)，與社會道德和文明優劣密切聯繫。⁵長期以來，抵達上海的外人基督教傳教士以傳播基督文明的先行者自居，強調在華的西方人不能只熱衷於開拓市場和傾銷商品，也不能只考慮帝國的政治和軍事擴張，更重要的是還必須與華人社會中的愚昧、黑暗作鬥爭，拯救深陷邪惡崇拜之中的異教徒，實現中華歸主(conquer China for Christ)的傳教理想。1897年，作為上海外人基督教領袖人物的繆爾黑德(Muirhead)主教為紀念上海傳教五十周年所做的布道中指出：儘管上海租界發展迅速、成就輝煌，但道德淪喪驚人。這是由於從中國各地蜂擁而來的下層移民，加劇了道德風氣的敗壞，因而呼籲：「有些事情雖可交由土著官員處理，但外人必須擁有自由，以清除華人中的無數劣跡和卑下道德。」⁶反觀此次禁娼運動的展開，正是由於1918年5月16日，租界17個外人宗教和社會慈善團體決議成立「上海進德會」(the Shanghai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1920年改為 the Shanghai Moral Welfare League)，高舉「清潔租界」(clean up the Settlement)的旗

⁵ Harvey J. Locke,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Venereal Diseases," p.836; Mary Spongberg, *Feminizing Venereal Disease: The Body of the Prostitute in Nineteenth-Century Medical Discourse*.

⁶ DR. Muirhead, "A Jubilee Review of Missionary Work in Shanghai," p. 412.

職，⁷不遺餘力地宣傳鼓動和奔走呼號，從而迫使負責租界市政的工部局不得不採取相應的禁娼措施。所以，當我們把目光聚焦於這些禁娼運動的發起者，研究也就不能不追問這些外人基督教傳教士與道德改良人士與租界其他外人群體、華人社會有什麼樣的糾結與互動，在此過程中又有怎樣的種族、文化或文明的考量和投射，並產生了怎樣的歷史影響和具有什麼樣的歷史意義？

二、持續走高的禁娼訴求與女性團體的積極參與

從上海租界開闢的歷史來看，進德會矢志於在外人社區的禁娼理念，其來有自也。早在 1871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醫官韓德森(Edward Henderson)提交的上海妓女調查報告(*Prostitution in Shanghai*)就曾指出：上海作為一個以男性為主體人口的移民城市，抵達當地的歐美僑民大多孤身一人。1870 年 3 月，租界長期居住的外僑男性 1281 人，平均年齡 28 歲，未婚居多，女性 218 人，男女之比是 58：1。⁸再作為遠東最繁忙的商埠，上海又彙聚來自世界各地的商船。1869 年進入上海港的船隻 1,823 艘，駛離船隻 1,833 艘。1870 年，租界每天流動人口平均約 1,101 人，⁹大多是來自停泊在港口的外國商船、戰艦上的水手和士兵。

⁷ “Moral Welfare Le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9 September 1922, p. 741.

⁸ 再如 1875 年，上海共有 1,763 名外國人，計英租界 1018 人，美租界 563 人，其中男性 1,086 人，女性 296 人。外國人的國籍分別為英國人 878 人，美國人 181 人，葡萄牙人 168 人。〈西人總數〉，《申報》，1876 年 10 月 18 日，頁 1。

⁹ Edward M. D. Henderson (Surgeon to the Municipality and officer of Health), *A Report on Prostitution in Shanghai; Drawn up for “The Council for the Foreign Community of Shanghai,”*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The North-China Herald*,” pp. 1-2. 此資料由美國加州大學 Santa Cruz 分校賀蕭教授提供，特此致謝。

韓德森沒有提及其時租界還有數量更多擔當苦力、小工、雜役的單身華人年輕男性，可能更多會不幸罹患性病，而是重點列出了外人男性患者的統計數字，這也讓工部局感到問題的嚴重。因為韓德森提供的那些外籍男性罹患性病者，多為由於工作上的原因而容易被記錄在案的巡捕、水手和皇家海軍士兵。具體數字是 1870 年，37 名外國巡捕共請病假 541 天，其中 205 天是因性病而請假；1871 年頭兩個月裡，外國巡捕因性病請假天數已達到 45 天，其中 36 人被確證傳染上了性病，4 人因病重而不得不回家。設立在港口，專門收容患病水手的「海員之屋」(Sailor's Home)，每天平均收治 35 名水手，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性病患者。此外，英國官方紀錄的 1862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抵達當地的英國艦隊性病發病率為 234.2%。¹⁰韓德森聲稱這還不是他一個人的看法，其英國同行，擔任港口醫生的珀維(R. Purve)也認為上海是一個性病蔓延的「滋生地」(a fertile)。¹¹1876 年，在韓德森提交給工部局的另一份報告中，稱醫學檢查只能針對那些專為外國人提供服務的妓女，如果對那些只為華人光顧的妓女們進行醫學檢查，「無疑將給財政帶來極大負擔，儘管工部局能夠支付這筆款項，但數目之大，令人尷尬。」¹¹

由於主要只由性病預防和治安管理方面做考量，負責市政的工部局長期以來並未籌畫如何根治界內道德風化和猖獗的娼妓業問題。韓德森估計，法租界約有 250 所妓院，2,600 餘名妓女，其中外國人經常光顧的 24 所，大約有 90 名妓女；洋涇浜河以北的外國租界約有妓院 493 家；外國人經常光顧的妓院為 27 家，還有 35 家既接待華人，

¹⁰ Edward Henderson, *A Report on Prostitution in Shanghai*, p. 25.

¹¹ "The Medical and Police Supervision of Native Prostitution," *Health Officer's Report*, 1878, p. 47; "Report of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of Venereal Disease in Shanghai," p. 10. 收入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 V1-16-2670。

又接待外國人，妓女總數為 1,612 人。除此之外，上海還有數量龐大、無法進行統計的暗娼，以及一些隨時給外國人提供性服務的傭婦、縫紉女工和洗衣婦。¹²韓德森說，這些華人女性染上性病之後，無一例外地找當地大夫進行治療，由於缺乏治療這類疾病的經驗，「當地大夫的診斷和治療不可信賴。」¹³實際上早在 1870 年前後，工部局就已決定對與外人經常接觸的妓女進行定期醫學檢查，身體健康者方能得到營業執照。1872 年，工部局計畫在福州路創辦一所設備齊全的性病醫院，專門醫治罹患性病的妓女。不過，由於這項提案需要 2,000 兩的財政撥款，在納稅人會議上遭到了否決。1875 年，駐上海英國海軍指揮官致函工部局，抱怨大批英軍士兵染上性病，要求租界儘快設立性病隔離病院，並對所有與外國人交往的妓女實行強制性的定期醫學檢查。工部局申辯道，不是不想採取相關措施，而是納稅人會議不同意撥款。於是，經英國亞洲艦隊總指揮官、副海軍上將雷德(Ryder)出面說情，再加上英國、美國在華艦隊的外科醫生和商船船長提供的性病患者統計資料，納稅人會議遂於 1876 年通過撥款議案，新的性病醫院於 1877 年 1 月 1 日正式接診。當然，精明納稅人之所以通過此項決議，並非出自改良租界道德風化的考慮，而是想著如果確實降低了性病患率，就可安撫英、美海軍軍官和商船船長，因為租界的繁

¹² 眾多在上海的外人男性浪跡青樓，原因之一還在於自上海租界開闢之後，外人男性與華人女性的非法性關係(包括嫖娼)，往往被外人社會的主流看作一種休閒方式而受到鼓勵；相反，如果出現婚姻，即白人男性娶華人女性為妻，就會受到家人、朋友、同僚和上司的種種非議和阻撓。甚至到了 1908 年，英國駐上海領事館還印發了一份秘密告示，強烈反對英國人同華人結婚，並威脅要將違反者永久驅逐出英國人的社區。參見 George Woodcock, *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p. 99.

¹³ Edward Henderson, *A Report on Prostitution in Shanghai*, pp. 11-12.

榮有賴於他們的更多到訪。¹⁴

與之相應，界內外人社區道德改良人士關於禁娼的奔走呼號也就由此被激起。畢竟，將預防性病、禁娼視為改良社會道德風氣，而非單一意義上的疾病救治和社會改革，是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在歐美社會風起雲湧的社會純淨運動(Social Purity Campaign)的重要訴求。1869年，以約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結合基督教福音教義，在英國發起了聲勢浩大廢除傳染病法運動(campaign against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反對政府通過對妓女進行定期醫學檢查，註冊登記等措施，默認妓院的合法存在。¹⁵1874年11月，美國婦女基督教節慾會(The National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WCTU)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Cleveland)成立，也開始了所謂的「婦女十字軍」(Woman's Crusade)運動。1895年，美國純淨聯盟(American Purity Alliance)成立，協調各方力量，積極鼓吹禁絕拐賣婦女和賣淫活動。再至1908年，美國婦女俱樂部聯盟(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成立，掀起了新一輪的抗議運動，並直接影響到各城市的市政選舉。¹⁶這股風潮影響到上海，租界外人道德改良人士積極行動了起來。1871年，即韓德森發表上海妓女調查報告之後，道德改良人士也曾多次發起遊說和請

¹⁴ “Memorandum by the Chairman,”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U1-5-66。

¹⁵ Baldwin Peter,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 pp.371-373; Timothy J. Gilfoyle, “Prostitutes in History: From Parables of Pornography to Metaphors of Modernity,” pp. 133-136; Judith R. Walkowitz, *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 Women, Class, and the State*, p. 90.

¹⁶ Peggy Ann Pascoe, “The Search for Female Moral Authority: Protested Women and Rescue Homes in the American West, 1874-1939,” pp. 10-68; Nancy Moore Rockefeller,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the Soldiers of Democracy: Patriotism Public Health and Venereal Disease Control On the West Coast 1910-1919,” pp. 124-174.

願，要求中止向界內妓院頒發執照和對妓女們進行定期的身體醫學檢查。1877年，工部局將此議案提交納稅人會議表決，結果反對票144張，贊成票只有23張而遭否決。¹⁷再至1888年、1890年，工部局又在道德改良人士的壓力之下，將停止對性病醫院撥款和關閉界內妓院的議案，兩度提交納稅人會議表決，結果又是以163：46、160：16而被否決。¹⁸1905年，一個主要由商人、天主教神職人員和基督教傳教士組成的委員會，對公共租界的性病和妓女進行調查之後，要求嚴格控制並逐漸廢除妓院發放執照制度，結果被認為無法操作和不切實際而遭到監察委員會(Watch Committee)的拒絕。此外，曾在美國紐約、芝加哥、愛荷華等城市成功掀起禁娼運動的美國基督教節慾會於1886年、1907年，先後兩次派代表前來上海遊說和鼓動，結果也都是無功而返。¹⁹

二十世紀初，歐美社會興起了優生學思潮(eugenics movement)，醫學實驗證明性病(梅毒、淋病)可能造成孕婦不孕、兒童先天失明，被稱為「種族毒藥」(racial poison)、「種族自殺」(race suicide)，受到各國政府和社會團體的高度重視；再加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保證士兵們身心健康地投入戰鬥，歐美各國又紛紛通過公共衛生立法或加強警察控制，發起了「預防性病和廢除妓女」的運動。這股風潮影響到上海，那些矢志禁娼的道德改良人士，尤其是以進德會名義向工部局提交的請願書中，都理直氣壯地援引歐美各國的這些禁娼舉措，大力強調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都採取了行動，上海租界不能再無動於

¹⁷ "Annual Meeting of Ratepayer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8 March 1877, pp. 237-239.

¹⁸ "Annual Meeting of Ratepayer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4 March 1879, p. 247; March 8 1888, pp. 245-247; 28 February 1890, pp. 244-245.

¹⁹ "Memorandum by the Chairman,"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U1-5-66。

衷。他(她)們爭辯道：不僅此前通過國家立法(State Regulation of vice)默許妓院存在的丹麥、挪威這時宣布禁絕娼妓，就連法國、德國也成立了專門討論廢除妓女的委員會。²⁰美國道德改良人士組成的淫業調查委員會(Vice Commission)，也於 1910-1916 年在各地調查妓女和賣淫業狀況，並陸續撰寫了一系列要求禁絕妓女的報告。政府和公眾的態度表現在，1916 年，美國大部分城市雖關閉了紅燈區，但仍有一些商人、法官、警察和市民稱此舉為「唐吉訶德式的狂想」，並不認為能夠徹底禁絕娼妓。²¹然而，美軍參戰後的第一周，聯邦政府頒發了針對陸、海軍和平民的預防性病條例。1918 年 7 月，美國成立社會衛生局(Social Hygiene Board)，負責編寫和出版各種宣傳性病的小冊子，在公眾場合張貼廣告、發表衛生演講，繪製預防宣傳畫，並提供大量資金，推進對性病的醫學和藥物研究。接著，35 個州先後頒布了預防性病的法令，其中有些州還立法規定結婚時必須提供醫生證明，保證新郎新娘都沒有被傳染上性病。²²此時，上海不少歐美男性紛紛返國從軍，在戰時民族主義亢奮情緒的鼓舞之下，這些道德改良人士又更加義正詞嚴地強調歐洲正在經歷戰爭，上海僑民自應以純淨的道德生活而支持前線浴血犧牲的戰士。²³

致使進德會形成聲勢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租界外人的性別比例在

²⁰ Walker, "To the Chairman of the 'Vice' Special Committee,"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 U1-5-67。

²¹ Rabbi Louis Witt, "Reform in Little Rock," 轉引自 Nancy Moore Rockefeller,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the Soldiers of Democracy: Patriotism, Public Health and Venereal Disease Control on the West Coast, 1910-1919," p. 58.

²² Harvey J. Locke,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Venereal Diseases," p. 837; 〈美國之公共衛生〉，《時報》，1920 年 4 月 11 日，第 1 張。

²³ "The Social Evil in Shanghai,"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3 December 1918,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 U1-5-67。

此時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女性人數的增加，直接推動了租界的改良道德風化運動的蓬勃展開。1915年，外人成年總人口 14,241 人，其中男性 8,197 人，女性 6,044 人，女性占到成人總人口的 42.4%。1918年，租界外人成年總人口增至 18,352 人，其中男性 10,527 人，女性 7,825 人，女性仍然占到成人總人口的 42.6%。²⁴再者，不同於 19 世紀上海開埠之初的外人女性，只是作為商人、傳教士、外交官的妻子；此時抵達的女性有很多是教師、醫生、護士等專業人士，其中不乏深受當時歐美社會方興未艾的女權思想影響，充滿道德改良激情的理想主義者。1917 年，《密勒氏評論》(*Millard's Review*)刊登由一位在上海的外人女性道德改良主義者撰寫的文章，稱 1916 年下半年有近 50 名美國基督教女青年會成員的抵達，當時在華有體面身分的歐美女性的約 5,000 人(不包括俄國女性)，參與基督教傳教事務的高達 3,835 人，占女性總人數的 76.6%。這些外人中的已婚女性 1,939 人，未婚 1,897 人，嫁作商人之婦的大約 1,000 人。由此，她豪情滿懷、躊躇滿志地說：以往西方文明對東方的影響，都是西方「男人」的文明(man civilization)，而很少注意到西方「女人」的文明(women civilization)。「鑑於在華外人中已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多半又從事日常的具體『文明化』(civilizing)工作，所以應該注意到她們的作用。」²⁵

上海的外人女性無疑是進德會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因為不論是從妻子，抑或從女性自主意識的角度，這些女性道德改良主義者都認為有必要將活動重心轉向租界道德風氣的改良。1898 年 11 月成立的美國婦女俱樂部，最初雖只是少數商人、外交官和傳教士的妻子們，每週相互交往和聯誼的讀書會，但很快就投身到改良界內道德風氣的宣

²⁴ "The Population of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5 January 1916, p. 95; 〈工部局之市政報告〉，《申報》，1919 年 2 月 19 日，第 3 張。

²⁵ M. H., "The Foreign Woman in the Orient," *Millard's Review*, 7 July 1917, p. 303.

傳運動之中。1910年，她們向工部局提交了禁娼請願書，主張關閉讓租界蒙受恥辱的妓院，廢除頒發妓女許可執照。²⁶再至1916年前後，英、美籍的女性道德改良積極分子共同組織了上海基督教婦女節制會(Shanghai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主席人是坎甯夫人(Mrs. L. E. Canning)。11月，該會在聯合教堂(Union Church)的講演大廳集會，安德森(W. E. Anderson)牧師批評了當地外人的道德墮落，呼籲工部局應設法為每位登岸的男性提供有益於身心的健康娛樂活動，並盡可能清除租界的賣淫活動。²⁷接著，該會向工部局遞交了一份由678名婦女簽名的請願書，要求關閉界內所有妓院。翌年2月，該會在同一個會議大廳召開會議，懷特(Laura White)小姐以「租界的社會情形」為題發表講演，稱夜晚出行，街上都處都是公開拉客的妓女，租界道德墮落對女性的戕害，「已到了全上海婦女都應關注和節制會成員都應考慮如何消除這些現象的地步。」²⁸2月21日，主席坎甯夫人在與工部局衛生官、督察長以及捐務監督會晤之後，又就禁娼問題致函工部局，要求對此進行答覆，並說特別希望得到關於妓女的註冊登記以及她們在性

²⁶ Anne Walter M. D. Fearn, *My Days of Strength: An American Woman Doctor's Forty Years in China*, pp. 158-159. 在1910年前，該俱樂部還只是一個很小的社交圈子，經常參加活動的成員也只有24人。1910年以後，俱樂部人數開始快速增加，1916年超過200人，1918年就有71名新成員加入，至1919年註冊會員已達到400人。此外，租界近2,000名英國女性中，有不少是英國婦女聯合會(British Women's Association)的成員。“American Woman's Club, Has Remarkable Growth,” *The Chinese Press*, 5 October 1919, p. 4; Growth and Service, “American Woman's Club Celebrates 22nd Birthday Next Tuesday Afternoon,” *The Chinese Press*, 12 November. 1920, p. 4; “British Women's Association,”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6 March 1921, p. 813.

²⁷ “Women's Temperance Union Lectur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4 November 1916, p. 259.

²⁸ “The Seamy Side of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0 February 1917, p. 284.

病醫院進行檢查的情況的回覆。²⁹3月，該會舉行成立兩周年紀念茶話會，懷特小姐又以「上海女性的責任」為題又發表演講，宣稱女性們「僅僅保持家庭內部潔淨，是遠遠不夠的。她們需要走出家門，讓這個城市對其孩子來說也是潔淨的。」³⁰

逮至1918年，女性團體的呼籲更為頻繁和高調。2月初，婦女節制會開始討論如何發起一個能將華人喚醒的公開運動(a publicity campaign so that the Chinese might be awakened)。³¹4月4日，該會召開會議，集中討論了關於預防性病和禁絕妓女的議題。4月8日，主席坎甯夫人致函工部局總辦藍台爾(N. O. Liddell)，力促設立調查界內道德風氣的委員會。12日，女性教會聯盟(The Union Church Ladies' Society)緊隨其後，也力促工部局設立界內道德風氣調查委員會。³²18日，上海傳教會和中華基督教婦女節制會致函工部局，邀請總辦或監察委員會主席就性病和妓女問題發表講話。工部局予以拒絕，並回覆道：「衛生官建議，應要求該會將其所作報告細節及調查詳情交來，但董事們的一致意見是：現在就應作出答覆，繼續與該會通信往來已無用處。」³³接著，26日，國王女兒會(King's Daughters' Society)召開了會議。29日，該會總辦西蒙(A. D. Simon)小姐致函工部局總辦藍台爾，表示支持婦女節制會的要求，敦促工部局為改良租界道德風氣考慮，應儘快同意成立專門調查委員會。5月3日，母親聯合會上海分部(Shanghai Branch of the Mothers' Union)召開專門會議，做出了相同決議，並於6日由總辦鄧肯(Heklen C.

²⁹ 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1917-1919)》，第20冊，頁608。

³⁰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the Second Birthday Party,"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9 May, 1917, p. 381.

³¹ "The Anti-Vice Campaign, Thursday's Meeting at Union Hall," *The North China Herald*, 9 February, 1918, p. 325.

³² 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1917-1919)》，第20冊，頁608。

³³ 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1917-1919)》，第20冊，頁612。

Duncan)夫人致函工部局。9日，美國婦女俱樂部總辦韋布(Mignonne M. Webb)再次致函工部局，稱通過閱讀《大陸報》(*The Chinese Press*)的報導而瞭解到了事態的發展，故也提出與此前那些女性團體的相同要求。對於這些女性團體的呼籲，可以明顯看出工部局敷衍搪塞的態度，是總辦藍台爾將4月26日致婦女節制會的回覆，幾乎一字未改地依次拷貝給了所有這些提交請願書的女性團體，稱工部局期望從實際操作的角度，而非完全從宗教和道德觀點出發「來考慮和討論界內道德狀況的問題」。³⁴所以，正是在反復陳情，沒有得到工部局積極回應的情況下，1918年5月16日，上海基督教佈道會(Shanghai Missionary Association)出面推動，租界17個宗教和慈善團體成立了進德會。

三、呼應美國禁娼與關注外人的道德風化

儘管在進德會成立時的租界歐美人口中，以英國人的5,341人為最多，美國人次之，為2,264人；³⁵且進德會中也不乏一些積極參與的英國人，然而，這一團體的主導者及那些最熱衷的參與者卻可能還是美國傳教士或美國籍的道德改良人士。委員會的11名成員中，傳教士占了7人，被選為委員會主席的是受美國南方浸洗會(Southern Baptist Missionary)派遣，1902年抵達上海的樂靈生(Frank Joseph Rawlinson)。早在1912年，樂靈生就參與，並隨後主持了在華歐美基督教會最重要的傳教期刊《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的編輯事務，被時人稱為在華最有影響力的白人之一。樂靈生認為在華基督教傳佈福音的目的，不僅在於拯救這個異教民族，且還要按照福音理想對華人社會進

³⁴ "Moral Conditions in the Settlement," *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1918, p. 90b,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U1-16-4748。

³⁵ 〈工部局報告摘要〉，《申報》，1920年11月18日，第3張。

行道德改造，以建立一個人間的上帝之國；否則，教會對華人的靈魂拯救將是不完全、不純粹和不徹底的。1918年6月2日，樂靈生以進德會主席的身分，在致函工部局總辦藍台爾的第一封信中，稱委員會將「致力於改良上海的道德風氣。」³⁶再就被選為進德會秘書、主持日常事務的美國傳教士沃克(Alfred J. Walker)的言論來看，同樣也有在上海外人中重塑基督教的貞潔、莊重道德觀念的強烈意願。1918年12月的聖誕夜，沃克以「上海的道德」為題，在只為歐美僑民舉行宗教活動的聖三一大教堂(Holy Trinity Cathedral)佈道：稱在耶穌基督誕生的日子裡，為進德會理想進行祈禱。此時歐洲前線正炮火連天，僑民們如果期望自己國家取得勝利，就應該致力於讓租界社會道德風氣回歸純淨，「把上帝賜予的最好天賦傳佈給人們；從少數先知先覺者那裡將文化、知識和高尚理想傳播給大眾；不讓人們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對上帝賜予的教誨愚昧無知；也不要讓這座偉大城市相對於我們的宗教和人性，聲名狼藉、臭名昭著。」³⁷

與之相應，此次由進德會推進的上海禁娼運動，與美國國內道德改良運動的關係也就比與作為租界統治者的英國國內的道德改良運動關係更為密切。原因或在於，一方面是英國國內早在1887年就中止了曾被廣泛批評為默許妓院存在，1865年頒發的傳染病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s)，妓院成為非法存在，是警察取締的對象。此時道德改良人士鼓吹的禁娼重點只在龐大的海外殖民地。就如在此次上海的禁娼運動中，界內道德改良人士與英國禁娼事務的聯繫，是在1920年12月14日至18日期間接待了英國預防花柳病會的東方委員會，日程安

³⁶ "Copies to H.O. & C. S. P. For comment, Shanghai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Chruoh House, 81, Kiukiang Rd,"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U1-2-550.

³⁷ Dean Walker, "Shanghai Morals," *The Chinese Press*, 3 December 1918, p. 6.

排也只是讓其與工部局官員、道德改良人士和職業醫生進行座談，以及在美國女子俱樂部和一些教會學校做預防性病的講演。³⁸相對而言，此時正值美國國內經歷的所謂「進步年代」(the Progressive Era)，大批來自東歐等地的白人窮困移民、以及快速膨脹的城市，致使娼妓和性病成為美國社會最欲清除的道德之痛，並也為此時上海進德會密切關注，認為是最能進行參照對比的西方國家。³⁹進德會的文檔中列舉了當時世界各大都市城市中妓女的比例：情況最好的是英國倫敦，為 906：1，同樣作為世界性大都市的柏林、巴黎也只是 582：1 和 481：1，與上海租界為伍的歐美大都市，只有美國紐約的曼哈頓 (Manhattan)，城市人口與妓女之比為 155：1，不如日本東京的 277：1、中國北京的 258：1，僅比上海租界的 137：1 稍好一點。⁴⁰一篇由任職於上海的沙瑞(Tsary)醫生撰寫的文章，引用刊發在 1919 年 4 月《美國梅毒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Syphilis)的文章，稱美國紐約八十萬人口中約有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曾經是，或者還是性病患者。⁴¹1919 年 4 月，根據進德會提議，租界納稅人會議通過議案成立專門調查界內性病發病率、治療、妓院數量以及運營狀況的淫風調查委員會(Vice Committee)，分別致函設在紐約的美國社會衛生協會(American Social Hygienic Association)和洛克菲勒基金會下設的社會衛生處(Bureau of Social Hygienic)，請求提供

38 〈英國防禦花柳病委員將抵滬〉，《申報》，1920 年 12 月 9 日，第 10 版；〈防禦花柳病會員抵滬後消息〉，《申報》，1920 年 12 月 17 日，第 10 版。

39 Philippa Levine, *Prostitution, Race, and Politics: Policing Venereal Disea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p. 223.

40 “American Social Hygienic Association;” “To John D. Rockefeller Jr. Esq., Chairman,”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 U1-5-67。

41 M. L. Tsary M.D, “The importance of venereal clinics, with a report of 400cases from the ST. Luke’s genitourinary clinic, Shanghai,” p. 172.

美國一些主要港口城市的娼業調查報告和市政當局採取的措施，以及美國學者關於紐約娼業的研究著作的拷貝，並保證所有費用都由委員會承擔，「收到寄來的資料之後，立即匯款。」⁴²

另一方面，英國人作為租界的開闢者和最早一批抵達的外國僑民，長期以來一直把持著市政管理和界內主要工商企業，社會地位普遍高於其他國家之人，故在其生活圈子裡總被人提醒「別忘了你是位英國人」(Don't forget you're British)。即使新來之人，經常得到的諄諄教導，也是要與華人保持距離，包括社交、性、乃至吃中餐和學說漢語等各個方面，以維繫其殖民統治的凝聚力和合法性。⁴³相對而言，在當地的美國人則有一批是處在底層的冒險家，不受英國人圈子的文化和道德約束，並也無視租界的英國法律而敢於放浪形骸、無所不為。1907年，《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特約通信員的一篇文章在談及上海外人的道德狀況時，說這個社區的墮落是公開且無恥的，上海暗娼成了當地外國僑民社交生活的中心。作者進而指出：沒有一份統計報告可以說清楚上海讓西方基督教道德蒙羞的全部陰暗面。更甚於賭博和酗酒的，是很多白人擁有中國情婦，一大批歐亞混血人是上海城市的悲劇特質；正人君子、道德高尚之人只是這座城市的少數；更沒有人理睬傳教士們一直呼籲未婚男人們回歸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的基本莊重理念，和母國值得尊敬的社會傳統。傳教士與其他白人男

⁴² "Special Vice Committee to American Social Hygienic Association;" "Special Vice Committee to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Combating Venereal Diseases;" "Special Vice Committee to Health Officer;" "Special Vice Committee to American Social Hygienic Association,"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 U1-5-66。

⁴³ 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 pp. 78-114.

性之間存在著頗深的溝壑，經常相互批評和指責。⁴⁴再至 1908 年 5 月，《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駐上海特約通信員也稱：這裡外人社區中流行的一句口頭禪是「在中國口岸為所欲為」(anything goes on the China Coast)。不受中國政府管轄的上海租界，彙聚了眾多形形色色的外籍冒險家，不顧西方文明的倫理道德及其民族文化傳統，肆無忌憚地從事在其母國必定要受到譴責的不道德勾當。⁴⁵更為直接的呼籲，是 1910 年在美國大西洋城召開的長老會代表大會上，與會者籲請在華的美國男人應注意其生活方式所引來當地人的憎恨，該會海外傳教部(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秘書布朗(Dr. Brown)指出：「在遠東最壞之人(the worst men)不是本地人，而是放蕩的白人男性。憑藉政治方式進入中國的西方人以欺詐和詭計見長，憎恨美國人的情緒在中國不斷滋長。」⁴⁶

再與界內道德改良人士禁娼訴求密切相關的，是還有一批被認為是美國人的白人妓女。二十世紀最初十年，美國西部開發之後，從美國中東部來到西海岸的很多白人女性，一時找不到工作，就從三藩市登船抵達上海。她們上岸後，如果還是找不到工作，有些人便重操舊業，再度皮肉生涯；另還有一些被上海、香港和洛杉磯的跨國犯罪集

⁴⁴ T. Elli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Times, "Reform Sirocco, Shanghai,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21 Apr 1907, p. V18.

⁴⁵ A Thomas F. Millard, "Why Criminal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re Fighting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The Washington Post*, 22 Mar 1908, p. M4.

⁴⁶ "Split of Heresy report," *The Washington Post*, 27 May 1910, p. 1. 自 1917 年抵達上海，後任《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的鮑威爾(J. B. Powell)也說：早在美國佔領菲律賓期間，上海就已成爲美國投機騙子和冒險家的樂園。再至塔夫托(William Howard Taft)擔任美國駐菲律賓第一任總督之後，又把在當地一批臭名昭著的美國人驅趕出來。於是，他們之中很多人來到上海，從事出售假珠寶、空頭股票、專賣藥和危險品等不法活動。中譯本：邢建榕等譯，《我在中國二十五年——《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回憶錄》，頁 15-16。

團從美國各地拐騙到上海的白人女性，她們均被稱為「美國女孩」(American Girls)。⁴⁷針對「美國女孩」之所為，1907年《洛杉磯時報》特約通信員指出，在上海的富有商人，即使有家室者，也有和「美國女孩」一起喝茶、打發下午時間的習慣。美國人幾乎壟斷了當地所有的商業惡行，諸如賭博、拉皮條、敲詐保護人和放蕩女人。在東方外國人的正派人圈子裡，奉行的格言是不雇用「美國女孩」，因為她們聲名狼藉。一位美國父親甚至不願意將自己女兒稱作「美國女孩」。讓這位通信員悲歎的是，當他第一次造訪上海時，親眼看到那些不幸是他的同胞，身著華貴服飾的白人女子，「乘坐奢侈馬車沿著靜安寺的路上蕩來蕩去。」⁴⁸1908年5月，《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將「美國女孩」歸結於英國在遠東的殖民統治，自認為種族優越的英國殖民政府，在印度、緬甸、新加坡等地嚴禁英國女性從事不道德職業，由於都使用英語，美國女性也在被禁止之內，對其他國家的女性則不聞不問。中國的情形是一個例外，美國女性在香港從事色情活動，只要不使用英語，就不被禁止。上海是一個國際化港口城市，工部局對他國公民沒有刑法處置權，除嚴格控制英國女性之外，對美國公民的不良行為只能聽之任之。⁴⁹

⁴⁷ 如1909年2月，在美國伊利諾斯州警戒協會(Illinois Vigilance association)的年會上，最先發言的雷諾(James Bronson Reynolds)談及「美國女孩」的問題，稱在橫濱、上海和美國西海岸城市，存在一些有組織販賣婦女的幫派，專門引誘年輕無邪的芝加哥姑娘(blameless Chicago girls)從事邪惡行業，以至在上海的「美國女孩成為不道德的同義詞。」“Tell About Vice, Suggest Remedy, Reports Made on White Slave Traffic at Meeting of Vigilance Body,” *Chicago Daily Tribunes*, 9 February 1909, p. 9.

⁴⁸ William T. Elli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Times, “Reform Sirocco, Shanghai,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21 April 1907, p. V18.

⁴⁹ Thomas F. Millard, “Why Criminal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re Fighting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The Washington Post*, 22 March 1908, p. M4.

作為對世紀初興起的美國國內「道德純淨運動」(moral purity campaigns)的直接呼應，⁵⁰1906年6月，美國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個海外法庭(United States Court for China)。該法庭矢志於矯治在華美國人的不端行為，以維護和推進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和威望」(sustaining and advanc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restige in the East)。⁵¹被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任命為首任大法官的，是曾在菲律賓擔任過五年首席檢察官(Attorney general)的威爾夫利(Lebbeus Redman Wilfley)。該法庭成立後頒佈的第一個公告，是取締界內被稱為「美國之家」(American Houses)的白人妓院，驅逐被稱為「美國女孩」的白人妓女。這項行動要求所有在華美國公民，必須在規定期限內提交證明國籍的法律文書和良好道德的證明，並在上海的美國海外法庭當場進行檢驗；到期不驗證者，將視為自動放棄美國國籍。八個所謂的「美國之家」於是被推上了法庭，結果發現其中四個老鴇不是美國公民。有一個表示接受美國法律裁決，認罪伏法的老鴇，也不是美國人。由於擔心被起訴，那些不是美國公民的人立刻到所屬國領事館登記國籍，一些非法分子則試圖通過婚姻獲得美國國籍。於是，一個搞笑的廣告張貼在上海外人居住區：「招夫——報酬 1,000 美元，專為非美國人申請」。在此專項整治過程中，美國法庭雖未嘗

⁵⁰ 1909年7月4日，愛荷華州最先立法禁止妓女。翌年，在俄勒岡州、華盛頓、加利福尼亞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美國聯邦直轄區)也就是否設立紅燈區或禁止妓女的立法展開了激烈爭論。1911年，該法令引入加利福尼亞州，1914年立法通過禁止娼妓。Peggy Ann Pascoe, *The Search for Female Moral Authority: Protested Women and Rescue Homes in the American West, 1874-1939*, pp. 10-68; Nancy Moore Rockafellar,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the Soldiers of Democracy: Patriotism Public Health and Venereal Disease Control On the West Coast 1910-1919*, pp. 124-174.

⁵¹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China," *The North China Herald*, 6 July 1906, p. 34.

實際關閉過一個妓院，但當地的美國道德改良人士則認為以「美國妓院」、「美國女孩」為名的一些邪惡活動已然受到制止，一些陷入絕境的美國女孩返回了家鄉。⁵²美國國內的主流輿論就此也發表評論，稱強烈道德意識正席捲東方，這不是由傳教士們掀起的，而是在上海的美國法官威爾夫利推動的，強調「在這個港口城市的大多數外國人中，威爾夫利法官此時可能不受歡迎。儘管如此，幾代傳教士都試圖提升和改善此地美國人的道德水準和聲譽，結果讓威爾夫利法官一夜就差不多完成了。」⁵³

威爾夫利法官大刀闊斧的驅逐措施，遭到了界內利益集團的反對，引發了一場轟動美國朝野的彈劾風波。1907年，曾被威爾夫利法官整治過，也是反對派代表人物的安德魯斯(Andrews)律師前往華盛頓，通過美國律師互助會(American legal fraternity)向司法委員會提供了一份長長的指控報告，稱威爾夫利法官主持的上海美國法庭獨斷專行、不尊重律師和公民權利。這份報告同時公諸於報端，引發輿論一片譁然，國會一些反對派成員乘機提出撤除此法庭的議案。⁵⁴1908年5月，由總統任命、國務卿魯茨(Roots)負責的司法委員會(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的附屬委員會(subcommittee)對安德魯斯的指控進行了專案調查。在聽證會上，威爾夫利法官向調查委員會陳述了他所做的一切，聲稱自己只是為了純淨在上海的外人社區(the purification of the foreign quarter in Shanghai)。指控方安德魯斯則辯稱，上海作為中國的口岸城市，道德風氣受東方

⁵² Anne Walter Fearn, M.D., *My Days of Strength: An American Woman Doctor's Forty Years in China*, p. 163.

⁵³ William T. Ellis, "Reform Sirocco, Shanghai,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21 April 1907, p. v18.

⁵⁴ Thomas F. Millard, "Why Criminal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re Fighting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The Washington Post*, 22 March 1908, p. M4.

社會特定地理環境影響，威爾夫利法官試圖以 1,000 美元的罰款，將那些被認為沾有不良習性的美國婦女驅逐出去，註定無法取得實效。最後，調查委員會駁回了安德魯斯的指控，羅斯福總統聞訊後，在致國務卿魯茨的信中說：威爾夫利法官受到了攻擊，不是由於他的工作失誤，而是做的太好。「如果這些攻擊成功了，將會使那些努力維護我國在東方榮譽和利益的誠實公務員們氣餒和沮喪。得到好處的是妓院的老鴇、靠詐騙為生的律師，以及在遠東憑藉敲詐致富和腐化的墮落之人。這也是一些想破壞美國在中國良好聲譽的人。」⁵⁵為之喝彩的自然少不了進德會重要支持者，如時任上海美國婦女俱樂部主席的費恩(Fearn)醫生說：威爾夫利法官以超人正直和勇敢，為在遠東維護美國威望(American prestige)做了大量工作，「像上海這樣聚集大量外國僑民、幾乎不具備道德約束的地方，威望(prestige)是非常重要的，租界各社區的領導人物對之興衰能夠發揮很大作用。」⁵⁶

「美國女孩」之所以讓外人道德改良人士深惡痛絕，背後還隱涵著當時歐美社會「白人至上」的主流意識形態。因為上海租界的這批白人妓女常常與被認為是與低等種族、或落後文化的華人嫖客進行性交易，⁵⁷這也體現在進德會成立後主要關注的也是俄國難民家庭的白

⁵⁵ "Wilfley is Vindicated," *The Washington Post*, 3 March 1908, p. 1.

⁵⁶ Anne Walter Fearn, M. D., *My Days of Strength: An American Woman Doctor's Forty Years in China*, pp. 160-164.

⁵⁷ 對於華人與西人妓女的交往，當時在上海的黃式權記述道：「西國青樓，多在二洋涇橋一帶。華人之能效洋語者，亦可洞入迷香，花眠柳躡。然其人大都唇齒蓬頭，無異藥叉變相。獅王一吼，見者寒心。獨日西巴尼亞國人則不然，姿質明瑩，肌膚細膩，纖柔溫麗，兼擅其長。」參見黃式權，《淞南夢影錄》，頁 124。然而，這也讓當地英國外交官感到格外難堪。如 1918 年 11 月 14 日，香港總督在盧格德(F. J. D. Lugard)致殖民大臣格魯(Grewe)伯爵的信中，憤怒指責那些願意為亞洲嫖客服務的白人婦女「丟了她們國家的臉」(disgrace their nationality)。18 日，英國駐上海總領事致

人年輕女性，而非數量更為眾多、境遇更為悲慘的華人妓女。1917年俄國爆發革命，大批遠東白俄難民由海參崴(Vladivostok)乘船，或由哈爾濱乘火車輾轉至上海。1919年4月的調查表明：在虹口註冊包括日本妓女在內的682名外國妓女，來自俄國的妓女人數為95人，占總人數的13.9%，是當時白人妓女中人數最多的一個群體。⁵⁸見諸於進德會禁娼文字的，更多是關於這些俄國妓女的悲慘境遇。1921年，《北華捷報》刊發的一篇文章寫道：目前在上海陷入困境的大批俄國女性，以往在俄國生活優越，屬於貴族或資產階級家庭，多沒有工作技能；再加上她們多不會英語、漢語，要想在上海生存下去，只能靠出賣身體以獲取食物、衣物和住房。⁵⁹實際上，隨著俄國難民船隻的陸續抵達，俄國妓女人數在此後幾年中一直有所增加，至1924年，一位工部局的警務官員抱怨道：「街頭拉客及公園裡秘密性交易現象日漸增多，雖不能完全歸咎，但在很大程度上可認為是上海目前有大量正在避難，且為貧困所迫的俄國女性所致。」⁶⁰再至1926年4月，工部局衛生處公佈的性病新增案例，美、英、德、日、以及朝鮮、馬來人等所有在滬外人患者不過187例，而俄國患者達到347例。⁶¹幾乎與之同時一篇外人撰寫的新聞報導，也特別指出這些白人妓女的收入，很大部分來自於華人嫖客。⁶²

信香港總督盧格德，也重複了這一觀點，並稱上海白俄猶太女性在這個行業當中，較其他白人女性「更下賤和更討厭」。Philippa Levine, *Prostitution, Race, and Politics: Policing Venereal Disea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p. 230.

⁵⁸ 〈外國妓女之統計〉，《時報》，1919年4月24日，第3張。

⁵⁹ “Needy Russians in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Herald*, 31 December 1921, p. 885.

⁶⁰ “Municipal Gazette New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9 March 1924, p. 498.

⁶¹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6,”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U1-16-705。

⁶² H. K., “The Moral Welfare Le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6 February 1925,

儘管白俄妓女的人數並不構成上海妓女的多數，但由於媒體集中報導和社會重點關注，她們自然也就成為進德會諸君最期望外人社會給予施救的對象。1919年2月18日下午，美國婦女俱樂部舉行會議，報告者痛感俄國妓女將自己的身體「出賣給華人」(are being sold to Chinese)，呼籲外人社會應儘快提供生活救濟；否則，這種狀況將不可避免地持續下去。⁶³作為回應，1921年前後，關於如何幫助白俄女孩走出生活困境的報導在外人報刊更為常見。8月10日，署名「一位工作母親」(a working mother)寫道：阿波羅劇場海報欄裡有大量拐賣婦女的驚人消息，不知當局是否知道，「上海一些卑鄙之人，從哈爾濱、符拉迪沃斯托克拐賣俄國少女而獲利極豐。請採取措施制止這些犯罪行為吧！」⁶⁴至於具體救助的措施，有讀者致函《北華捷報》編輯部，稱自己早上看到一群從界外咖啡館喝得爛醉如泥的俄國女孩乘車回家，希望能夠借助報紙參與籌集救濟基金。這位讀者呼籲：「保護女性是男人的職責——不論她們的國籍是什麼——而非鄙視生活留給她們身上骯髒的印記，這些為了不被餓死而被迫出賣身體的妓女。」⁶⁵一個月後，《北華捷報》刊文回應道，稱雖然很難估計俄國妓女的確切人數，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們的人數還在增加，因而建議工部局集中力量做兩件事：一、採取措施阻止沒有生存技能的俄國人湧入上海，不給那些沒有財產和沒有職業的俄國人發放登岸許可，讓他們返回可能比上海更容易生活的海參崴；二、採取必要救濟措施幫助已經登岸的俄國人，使之能夠有住房、食物和儘快找到工作。⁶⁶

p. 218.

⁶³ "American Woman's Club,"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2 February 1919, p. 481.

⁶⁴ "White Slave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3 August 1921, p. 483.

⁶⁵ "The plight of Russian Girl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5 November 1921, p. 389.

⁶⁶ "Needy Russians in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Herald*, 31 December 1921, p. 885.

四、對禁娼的各方反應及背後纏繞的利益衝突

與進德會發生爭執最多的，是向來就不認為禁娼主張能夠付諸實施工部局，這背後多少有些不願讓自己的行政效率乃至治理權威受到批評、責難和挑戰的考量。1918年6月26日，成立不久的進德會致函工部局總辦藍台爾，要求在官方的市政公報上多刊載一些預防淋病和梅毒蔓延的文字。藍台爾將此函轉給職能部門的衛生署。7月8日，衛生署長斯坦利(Auth Stanly)回覆道：以往市政公報中已刊登了不少相關文章，如果再有所增加，恐怕公眾還沒有成熟到能夠接受如此之多涉及兩性關係的文字。10月26日，斯坦利在致藍台爾的信中，又談及進德會要求中止市政當局對妓女定期的醫學檢查，稱如果將之付諸實施，會使更多人罹患性病。他列出的統計數字表明，以往定期的醫學檢查減少了10%的淋病、50%的梅毒、75%的軟性下疳的傳染病例。至於進德會批評那些經過定期醫學檢查的妓女，拿到工部局衛生署頒發的健康證明，將之作為招攬生意的廣告，反起到推波助瀾的負面作用，斯坦利辯解道：如果將這些醫學檢查證明放在醫院，而不是掛在妓院的牆上，巡捕如何能隨時進行檢查核對？⁶⁷此外，工部局官員也認為如果完全禁絕界內妓女，需要動用大量警力，然而，1918年租界共有歐美籍巡捕155人(原額不止於此，由於戰爭原因，泰半返國從戎)、印度籍巡捕69人、日本籍巡捕30人，華籍巡捕1321人，以及管門印度籍巡捕175人，管門華籍巡捕16人。⁶⁸1919年1月16日，巡捕房總辦致進德會的信中，稱界內每平方英里只有306名巡捕，包括歐美人、

⁶⁷ "To the Secretary," 8 July 1918,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U1-2-550。

⁶⁸ 〈公共租界巡捕總數〉，《時報》，1918年4月18日，第3張。

錫克人和華人的巡捕在內，每一萬人中只有 32 名巡捕，根本無法禁絕妓女的存在。⁶⁹所以，1919 年 2 月 14 日，斯坦利致藍台爾的信中，可能最明確表達工部局官方對進德會的私下態度，稱至今未看到委員會對改良上海道德風氣提出一條建設性意見，「他們所作所為顯然是妨礙，而非幫助工部局。」⁷⁰

再者，身處界內權力和立法頂端者，是有資格參加納稅人會議之人，工部局的態度多少反映了他們對進德會禁娼訴求的認知和考量，並關係到娼妓業涉及的巨大經濟利益。按照租界土地章程，能夠參加納稅人會議、且擁有投票權的，是擁有價值為 500 兩銀子以上的房產、每年支付 10 兩以上房地捐稅者；或每年收取房租達 500 兩銀子以上和交納房屋捐稅者。1918 年前後，租界約三萬名外國僑民中，合格的納稅人約 2,700 名，將近占外僑人口的 9%。⁷¹由於能夠獲得遠高於一般商業活動的利潤率，這些納稅人的房地產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被出租為色情場所。一位外人居民寫道，歐洲人開辦的妓院有兩種：一是公開營業，另一種則是打著沙龍或咖啡館的幌子，「儘管這種現象存在

⁶⁹ “To the Actg. Secretary of S. M. C.,”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 U1-2-550; *Report on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of Venereal Disease in Shanghai*, Reprinted from Supplement to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of January, 1924, p. 17,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 U1-16-26。

⁷⁰ “Copy for Captain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 U1-2-550。

⁷¹ 其時投入上海的外國資本總數達兩億英鎊，其中近三分之一，即 6,000 萬鎊由英國人控制，主要為土地、建築、企業股票和債務證券中的資本。租界由外國人控制的房地產，登記總額為 5,260 萬鎊，屬英國人者達 4,400 萬鎊，美國人、日本人不過分別為 300 萬、400 萬鎊。甚至在法租界，一半以上的土地資產也歸英國人控制(900 萬英鎊中的 460 萬)，法國人擁有的不過為 260 萬鎊。參見 Nicholas Rowland 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pp. 21-41.

於每一個大城市，但不得不承認在上海得到了更多默許和支持。」⁷²

此外，為了規避巡捕查辦，還有很多華人妓院掛著洋商名號，經常出現的情況是界內某華人妓院經會審公廨判處關閉，後由某洋行出面要求再開；以及某妓院因房租未付清，房東乃藉曾掛有洋商招牌上訴。⁷³由於事關自己的巨大經濟利益，長期以來納稅人會議對於界內道德改良人士提交的禁娼方案，總是予以投票否決或故意缺席會議而予以擱置。最能表明他們對進德會禁娼要求的態度，是 1918 年秋進德會按照上海洋行職員的通訊錄，給所有外籍男性成年人寄發了關於預防性病、禁絕娼妓的出版物，引起了相當一批納稅人的反感，他們紛紛致函工部局總辦藍台爾，要求進德會立即停止這一不加區分、冒犯個人隱私的行為。⁷⁴不料，弄巧成拙的是 1920 年 3 月，當淫風調查委員會提出分五年時間逐步廢除租界妓院的提案，在納稅人會議予以表決時，很多本應參加投票的納稅人因反對而故意缺席會議，致使提案在會場上只有贊成者的情況下獲得通過，工部局則不得不頒發禁娼法令。⁷⁵

由於其時在上海的外人並非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也不是每個人都自認為肩負著在華傳播西方文明的使命，很多人大概也不排斥或反對上海的燈紅酒綠、繁華現代都市的夜生活，從而成為了進德會禁娼主張的最大消極應對群體。其時，上海影響最大的英文報紙是《字林西報》的星期附刊《北華捷報》，標榜既不為英國政府，也不為工部局

⁷² Citizen, "Shanghai's Moral Welfar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9 April 1919, p. 103.

⁷³ 〈整頓上海風化之會議〉，《時報》，1919 年 4 月 9 日，第 3 張。

⁷⁴ "Moral Conditions in the Settlement;" "To Rev. A. J. Walker, Honorary Secretary, Shanghai's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N. O. Liddell, February 6, 1919; "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1919,"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 U1-16-4749。

⁷⁵ "The Moral Welfare Le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6 August 1922, p. 571.

說話的獨立立場，是作為「上海精神」(Shanghai Mind)的體現，⁷⁶自然也就不能無視界內大多數外人的閱讀傾向，並進而擔心就此事的激烈爭論將導致其社區分成了兩個截然對立的陣營。⁷⁷1918年，該報刊登署名吉森(E. H. Gilson)的讀者來信，以「是否值得」(Is it worth it?)為題，質疑進德會的禁娼主張如果導致犯罪增加、妓女未被有效控制、性病繼續蔓延，對於改良界內道德環境是否值得。儘管該報接著刊登了署名Mason的讀者來信，聲稱界內藏汙納垢、淫穢放蕩，採行進德會提案，清除這些不潔之物，回覆是「當然值得」(are well worth while)；⁷⁸但更多的文章還是對進德會禁娼主張的批評。1919年4月，一篇署名鄧頓(Denton)的讀者來信，批評此時上海外人社區關於「道德福祉」(moral welfare)的討論，更多是支持／反對進德會主張雙方的相互攻擊，而非對賣淫、性病蔓延的罪惡(the evil)本身進行批判。⁷⁹1922年8月26日，該報編輯部以「進德會」為題發表長篇社評，指出進德會派調查人員扮作一般客人，混進名聲不好的妓院，引誘未成年少女喝酒，以取得該妓院非法售酒的證據。在社評作者看來，這種不誠實的行為，與不道德的妓女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為正人君子所不齒；並認為進德會的提案，非但沒有阻止那些心存邪念和道德敗壞者，「相反為他們提供了便利。」⁸⁰再至1924年該報又刊登了一篇評論，稱租界市政當局逐

⁷⁶ Nicholas Rowland 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pp. 65-66.

⁷⁷ J. J. Pope, "Moral Welfare le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 September 1922, p. 677.

⁷⁸ E. H. Gilson, "Is it worth it?" I. Mason, "Moral Welfar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1 December 1918, p. 748.

⁷⁹ Denton, "The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2 April 1919, pp. 102-103.

⁸⁰ "The Moral Welfare Le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6 August 1922, p. 571.

年取締妓院的措施，對於改良租界道德風氣，沒有產生明顯效果，並暗示進德會應對此時租界私娼盛行、巡捕執法困難的局面負責，以至一位進德會的支持者頗有怨言地致函編輯部，稱文明、文化和道德的進步不會一蹴而就；世界不會一夜之間變得更好；我們需要的是耐心，故不同意進德會主張已經失敗的說法，認為「如果貴報編輯能夠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幫助，這次禁娼或許現在就已經取得一個傲人的成功」。⁸¹

再從這份報紙陸續刊發的一些讀者來信中，或可看出即使有些外人雖不全然反對進德會的激進道德改良主張，卻對禁娼給其日常出行和交遊帶來的不便而頗有怨言。1922年2月6日，一篇匿名的讀者來信抱怨租界實施的禁娼措施雖收回了妓院的執照，妓女們卻沒有離開，反而在私下裡繼續活動，巡捕無法進行有效管理。為了查驗私娼，執法當局難免冒犯良家婦女，以致她們夜間不敢出門。⁸²由於說到外人社區發生的爭執，這裡的話頭或可轉到進德會的禁娼主張似也沒有得到租界眾多外人男性的充分支持。如在此前進德會為禁娼提案造勢之時，即1919年4月7日，也是預定召開納稅人會議表決投票的前一天下午的5點30分，進德會分別在惠中旅社(Palace Hotel)和卡爾頓咖啡廳(Carlton Café)召開了男性、女性聲援大會。男性參加的會議，到會人數75人；女性參加的會議，到會人數超過150人，會議氣氛更為熱烈。⁸³再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界內眾多外人女性社會團熱情參與進

81 Nil Desperandum, "Moral Welfar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2 March 1924, p. 457.

82 "The Moral Welfare Le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9 February 1924, p. 218.

83 "Speakers At Two Meetings Urge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Vice Conditions," *The Chinese Press*, 8 April, 1919, p. 10; "Two Moral Welfare Meetings Tomorrow," *The Chinese Press*, April 6, 1919, p. 16; 〈整頓上海風化之會議〉，《時報》，1919年4月9日，第3張。

德會，卻鮮見於其時界內也經常組織活動的外人男性社會團體，如高爾夫、網球、划艇、狩獵等各俱樂部的身影。難怪界內的女性道德改良人士強調此次禁娼，上海女性較上海男性承擔了更多社會責任。實際上，早在 1918 年婦女節制會召開的一次相關會議上，波爾克夫人 (Mrs. Polk) 就曾發表演說，稱已預見女性在這場運動中不能指望男人們的幫助，因為女性的使命就是要抵制非法性關係。男人雖具有選舉權，進行統治，但他們制定法令保護這些邪惡活動，並藉口說這是不可避免的邪惡，拒絕運用自己手中權力和鼓足勇氣去清除它們，「作為法律制定者和執行者的男人，不敢與這些邪惡抗爭。」⁸⁴再用當時一位女性活動家的話說，改良租界道德風氣的「整個問題基本上是要靠婦女來解決的，男人在這一問題上手法笨拙、反應遲鈍。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受過教育的中國婦女能夠對這項拯救事業感興趣。」⁸⁵

進德會高層是清一色外藉人士，工作語言為英文，日常活動很少有華人參加，故成立之初沒有受到華人社會的充分注意。只是到了 1918 年 12 月 20 日，《時報》以〈正風會之積極進行〉為題，率先報導進德會成立後的宣傳請願，及工部局的回應和舉措等一系列事態發展。⁸⁶1919 年 4 月，《申報》刊文稱讚「進德會排斥妓寮之主張，鍥而不捨，以求市議會之採納，外人忠於謀我，而務求於法律權力上達此蘄向，誠我人所宜感念也。」⁸⁷儘管《申報》有這樣的鼓吹，但此時華人社會關注重點不在預防性病和禁絕妓女，而在於正在召開的巴

⁸⁴ "The Anti-Vice Campaign, Thursday's Meeting at Union Hall," *The North China Herald*, 9 February 1918, p. 325.

⁸⁵ Festina Lente, "The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2 April 1919, p. 101.

⁸⁶ 〈正風會之積極進行〉，《時報》，1918 年 12 月 20 日，第 3 張。

⁸⁷ 〈排斥妓寮〉，《申報》，1919 年 4 月 9 日，第 3 張。

黎和會，日本企圖攫取德國在山東特權的野心。5月4日，北京爆發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上海以商人罷市、工人罷工作為回應，「妓女亦知愛國」見諸於華文報刊。以較多刊登當地新聞的《時報》為例，5月9日國恥日，報導數十名歌妓，發起停止歌宴，以志關心國事，各家門首俱貼有「停止歌宴」字樣，並互相勸告，此後購用國貨，以免利權外溢，「果能實踐其言，則其愛國之誠，亦殊可敬也。」⁸⁸6月4日之後，又有報導稱妓女們表示職業雖賤，但也是中國人，「於此時焉，若猶珠箔紅燈，金尊檀板，萬眾悲戚，少數歡娛，拂逆人情，殊大不詳也。」⁸⁹此外，報導還稱妓女們在寓所內特設學生飲茶休息所，陳設台椅，備有茶點多種，款待遊行示威的民眾；有妓女在門前大字書有：「青島問題發生，各界一致罷課，學生為國熱忱，吾界不忍坐息，敬備簞食壺漿，為君充饑解熱，並非釣譽沽名，不過稍盡綿力。下書妓界泣告字樣。如該妓女有此救國熱忱，亦殊可敬矣。」⁹⁰再為了防止意氣用事，引發外交糾紛，華文報刊還報導妓女金書玉等組織青樓救國團，團員達數十人，誓言是：「我們花界，斯業雖賤，愛國則一；願我同胞，抱定宗旨，堅持到底；國賊勿除，學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緊，切勿暴動，如遇日人，佯作不見；倘伊尋事，逆來順受，莫墮奸計，至要至要。」⁹¹

1919年5月至6月間的政治風潮平息之後，華人輿論對進德會的道德改良主張多持正面肯定態度，這似與其遭遇界內外人社區意見紛爭、舉步維艱的窘迫形成鮮明對比。《北華捷報》等英文報刊報導進德會消息時，總要談及納稅人會議及工部局的立場和態度，並對其激

88 〈妓女亦知愛國〉，《時報》，1919年5月10日，第3張。

89 〈妓女亦應罷市〉，《時報》，1919年6月6日，第4張。

90 〈花叢姊妹救國熱〉，《時報》，1919年6月11日，第4張。

91 〈青樓姊妹愛國熱〉，《時報》，1919年6月20日，第4張。

進主張多所批評。與其相反，滬上主要華文報刊多為讀書人創辦或主持，幾乎沒有刊登對進德會的批評文章，而更多是讚揚和表示欽佩。1919年10月，《時報》刊發一篇文章，鼓吹時事紛紜，提倡進德事業，淺識者流必嗤以為迂，惟娼妓日增，淫風傳播內地，入世未深之青年，往往失足而不能自拔，是害於個人者猶小，害於社會者絕大，「今進德會之成立，僉以禁止不道德之營業為挽救頹風之急務，眾擎易舉，凡有心世道者，益起而助之。」⁹²再至1921年12月，值進德會成立三年之際，在四川路青年會開第一次年會，《申報》評論道：進德會所謀福利，華人將獲十之九也，只是「由於華人加入之團體太少，故委員中只有華人二人，即曹雪賡、張廷榮二君，其餘悉為東西各國之人。」⁹³同樣，華人知識社團也對進德會表示了熱情支持。1920年4月，江蘇教育會、上海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會、海外華人協會、上海回國留學生聯盟等團體聯名發表公告，聲稱他們目睹了這些年上海賣淫業的氾濫和猖獗，堅信必須予以取締和禁止，並保證支持工部局頒佈廢除娼妓的一切措施和法令。⁹⁴就此，英文版的《大陸報》刊登消息云：本埠重要華人贊成調查淫業委員會之主張，已函勸工部局總董採納其議，「華字報多譯載其文，並著評贊助，足見華人頗留心於此問題也。」⁹⁵再至1924年5月，滬上著名知識人黃炎培、張東蓀、朱瘦桐、董壽慈等致函法租界工部局，稱敗壞風俗，「摧殘體育之事，莫烈於妓館，其犧牲女兒，蠱惑男子，誘淫造孽，染疾禍人，為害何

⁹² 〈禁止娼妓〉，《時報》，1919年10月23日，第3張。

⁹³ 〈上海進德會第一次年會紀〉，《申報》，1921年12月16日，第4張。

⁹⁴ Kinagsu Educational Assocn., Shanghai Educational Assocn.,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ssocn., Overseas Chinese Assocn., Western Returned Students' Union of Shanghai, World's Chinese Students' Fedn and Shanghai Chinese Y. M. C. A., "Vice Committee's Report,"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0 April 1920, p. 85.

⁹⁵ 〈華人贊成阻遏淫業之公函〉，《申報》，1920年4月5日，第3張。

可勝計？故抱人道主義者，無不深惡痛嫉，而亟欲阻止之。近年來公共租界取締娼妓，分期抽籤，閉歇各戶，已著成效。凡具良心之市民，莫不稱頌，而認為市中切要之一端。近聞閉歇之娼寮，往往遷居法租界，如在敏體尼蔭路一帶，妓院漸多，且該路與麋鹿路均有新建房屋多所，將租作造孽之場。麋鹿路靠近華界，亦不宜使向無妓館之地，薰染淫穢之習。」⁹⁶

不過，華人社會的上層商人對進德會禁娼主張頗多曖昧，這倒與界內納稅人會議及工部局立場和態度頗為相似。1919年12月2日，淫業調查委員會致函中國總商會主席(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希望瞭解該會對上海妓院和賣淫業的看法，及其對改良租界道德狀況的建議。⁹⁷不久，中國總商會回函，稱十分敬佩委員會為改良上海惡俗所做的不懈努力，並表示此事關係到社會公德，已要求下屬各商幫予以重視。總商會隨即得到的回饋，稱商人們有積極支持取締娼寮妓院；也有主張對妓院進行嚴格管制，「儘管意見有些不同，但都值得認真貫徹落實。」⁹⁸再至1920年10月，各路商界總聯合會也致函法租界總董，請求採取措施，以防止公共租界的妓女流入，並稱「上海為中外文化樞紐，世界觀瞻所系，而汙穢若此，寧非痛心，此公共租界廢娼案之所由起也。吾會同人，既表同情於議決之前，尤希望收良效於實行之後。」⁹⁹不過，從繁榮商業考慮，華人商會主張對不同等級的妓院予以區隔對待。此前於1920年6月8日，據餐飲業、旅館

⁹⁶ 〈請法租界當道取締娼妓函〉，《申報》，1924年5月20日，第4張。

⁹⁷ “To the Chairman,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U1-5-66。

⁹⁸ “Rough Translation of note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U1-16-962。

⁹⁹ 〈請防娼妓流入法租界之公函〉，《申報》，1920年10月5日，第3張。

業商會的請求，中國總商會曾致函工部局，稱當局勒令妓寮，一律領照，不分等地，本地商業，因是大受影響。華人商界向來將頭等妓寮作為紳商集宴之所，有增進地方發達和振興商務之關係，與餐館、飯館尤有生意關係，與二等、下等賣淫之地，迥乎不同。中國總商會特別建議：對於頭等妓寮，宜通融從寬，「惟吸食鴉片聚賭滋擾等事，自應辦理公共道德問題之際，考審禁止。」²³日，賈賓律師代表上海歌伎業，致函工部局，稱「歌伎大都不越出道德範圍，中國最良階級之人，日日集於歌伎之室，招待朋友，商議生意，此為已成習慣之事。如果歌伎也在被禁止之例，勢必影響到與之相關的餐飲、衣莊、鞋店、顯繡店、珠寶店、洋貨店、樂器店、大菜館。」¹⁰⁰作為一項後續發展，組織華人廢娼會的王無為、趙南公等人，聞訊後立即撰文嚴斥上海總商會，稱外人為廢娼運動，不遺餘力，華人群公竟從而阻撓之。「群公皆商界鉅子，允宜效美國商人之所為，努力於廢娼運動，節遊冶之資，造社會之福。」¹⁰¹

五、結論

儘管華人在進德會和此前外人道德改良人士的鼓吹宣傳中沒有多少話語權，且也不擁有直接影響力，但在其時上海外人社區和華人社會關於中／外，乃至東／西兩個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的激烈碰撞和衝突的歷史場景裡，華人難免不被其視為對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道德優越性進行自我認知、自我確定的「他者」(the other)。畢竟，自十九世紀以來，歐美社會形成的一個思維定勢是中國，或者說整個東方社會缺乏基督教的宗教意識，充滿了情欲，墮落而淫蕩，娼妓業和青樓

¹⁰⁰ 〈工部局公報發表關於妓寮函〉，《申報》，1920年7月8日，第3張。

¹⁰¹ 〈廢娼會對總商會之責難〉，《申報》，1920年7月9日，第3張。

文化的高度發達，並由此反襯基督教文明，或西方國家崇尚貞潔和莊重，道德和責任的優越及高貴。1919年，在上海外人中影響很廣的《大陸報》曾刊登了「華人比西方人更道德」的署名文章，稱中國城市沒有諸如在一些歐美城市，或租界裡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的紅燈區 (red-light districts)，因而可認為比西方人更道德。幾天後，另一篇題為「華人不道德？(Are the Chinese People immoral?)」的文字則反駁道：在中國，任何男人都可以比在西方更容易用錢買到女性，只要有相應的經濟能力，他就可讓這些女人永遠待在自己家裡，法律、公眾輿論和其家庭都不會反對。有些地區是兩個貧窮的男人共有一個妻子。作者的結論是：「他們當然沒有紅燈區，因為不需要。」¹⁰²

到底誰的文化或文明是莊重、純淨；誰的是放縱、淫蕩，這對於界內的這些外人道德改良人士，尤其是作為進德會高層領導者的基督教傳教士們至關重要。因為不同於那些只是發一筆橫財就走的商人、冒險家，以及偶然到訪的水手，他們不遠萬里地來到上海，多以拯救華人墮落的靈魂為己任，希望通過傳播純淨的基督教教義和先進的西文文明來改造中國。其領袖人物也曾雄心勃勃地宣稱：「要用道德、教育和進步來救中國 (We are told that morality is to save China, that education is to save China, that progress save China)。」¹⁰³長期以來，這些道德改良人士致力於通過各種慈善、教育事業，力求消除華人社會中的溺嬰、纏足、吸食鴉片和娶小老婆等所謂不道德、不文明的惡習劣俗，並也曾大力鼓吹和宣揚基督教和西方文明關於禁欲、奉獻、莊重和虔誠的行為舉止，毫不留情地批評華人社會中那些被視為墮落、縱欲、淫蕩和邪惡的生活方式。雖則，這些舉措有太多仁者救人、勸人行善的正面意義；

¹⁰² "Are the Chinese People Immoral? --A Reply," *The Chinese Press*, 11 May 1919, pp. 12-13.

¹⁰³ "The Place of the Missionary,"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5 September 1915, p. 817.

但確也強化了在他們心目中關於歐美國家道德風化較中國社會道德風化、西方文明較東方文明更為優越、更為高等——這一類或可被歸結「歐洲中心主義」的意識和潛意識。1908年，刊登在《北華捷報》一篇呼籲在華外人必須進行道德改良的文字明確聲稱：「我們知道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天命(destiny)及其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pre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world)。他們今天持有這種優勢，今後也將永遠不會失去這種優勢」。¹⁰⁴再至1919年1月，當進德會宣傳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之時，進德會主席的樂靈生和一些支持者們在公眾大會上的演講，也稱東方人的道德水準不如西方，租界道德狀況卻不堪入目，迫切需要「外國人通過以身作則，成為他們的道德楷模。」¹⁰⁵所以，這些外人道德改良人士矢志於解救白人妓女以及外人社區的道德風化改善，很難說不是旨在維持對華人社區在文明示範方面的居高臨下及道德上的優越感。¹⁰⁶

不過，讓這些道德改良人士深感焦慮的，是上海租界外人社區聲名狼藉的道德風化狀況。作為對比，當時華界雖也充斥著各種色情業，但受到中國市政當局法令嚴格禁止，妓女只能作為非法存在；而租界則由於實行註冊登記，交納捐稅和定期醫院檢查，娼妓在理論上被認為合法。早在1877年的租界納稅人年度會議上，界內最早的一批道德改良人士就曾呼籲作為基督徒的外人，理應以高於華人的生活方式、宗教和文明，及對異教徒華人社會的道德示範為驕傲，然讓他們感到羞恥的是，界內合法存在的娼業使「造訪當地的水手們沉溺

¹⁰⁴ "The Temperance Movement,"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7 January 1908, p. 135.

¹⁰⁵ "Shanghai's Moral Welfar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5 January 1919, p. 223.

¹⁰⁶ 參見拙文：Cheng Hu, "Venereal Disease Prevention, Moral Welfare and Civilized Image: The Shanghai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and the Anti-Prostitution Campaign in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18-24."

於非法的性關係(fornication)之中。」¹⁰⁷1890年，當納稅人會議又一次討論租界是否應該立法禁絕娼妓時，一位道德改良人士慷慨陳詞，稱華界在法令上禁止非婚性關係，「我們作為當地的文明社區(civilized community)，華界只是文明半開化社區(semicivilised community)，我們有上百家妓院，他們則不允許一家妓院公開存在，先生們，這難道不是我們的奇恥大辱嗎？」¹⁰⁸在進德會成立之後的宣傳中，他們也痛苦地承認，每年有許多新抵達的外國年輕男性，在界內的銀行和跨國企業任職，最初很多也許是正派人，但看到周圍之人都是放浪形骸，道德觀念也因之發生變化，「自然而然，他們會按照周圍之人的行為方式從事。」¹⁰⁹這種焦慮就在於原本應作為向華人社會展示基督精神、西方文明光輝形象的租界市政，一直默許娼妓業合法存在，致使如此之多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優秀青年在上海的十里洋場中淪為沉溺肉慾的酒色之徒——西方文明的倫理價值、基督精神的莊重和威嚴，在被他們視為異教徒的華人面前遭到踐踏和損毀。

的確，同樣作為對不文明「他者」的相互定義，當地華人社會通過進德會的宣傳資料、調查報告，及工部局展開的禁娼行動中，似又清楚地看到了在華外人道德生活中不光彩的另一面。1919年3月，進德會連續出版了四本批評界內娼妓盛行的小冊子，華人輿論評論道：華人妓院固與西人無直接關係，但西人亦有妓院設在滬上主要地點，「西人不道德行為暴露於外，實無過於上海。」¹¹⁰後至1920年3月，

¹⁰⁷ "Annual Meeting of Ratepayer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8 March 1877, pp. 237-239.

¹⁰⁸ "Annual Meeting of Ratepayer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8 February 1890, pp. 244-245.

¹⁰⁹ Another Citizen, "Shanghai's Moral Welfar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9 April 1919, p. 103.

¹¹⁰ 〈贊成進德會設立〉，《時報》，1919年10月23日，第3張。

由工部局官員參與的淫業調查委員會，通過一年多的審慎調查，承認界內妓女人數為各世界性大都市之冠。¹¹¹華人報刊則進一步指稱原因出在界內：「妓院房租，貴於普通之屋，可見地方贊成此妓業也。再查上海之地，大半用外人名註冊，可見此間西人實無形亦贊成之。若在英國，如果將房屋租作妓院，當受到嚴厲懲罰。天津英租界嚴厲禁止妓院，法租界也對妓院有限制，僅 144 所，而公共租界則幾乎沒有任何限制。」¹¹²同樣，此時到訪的華人文化和思想精英，對界內燈紅酒綠也頗多觸目驚心之感。1919 年 12 月，傅斯年赴歐洲留學，從北京抵達上海，候船期間短暫停留，沒有太多的上海印象，惟見租界內四馬路一帶，遊蕩著被當地俚語稱為「野雞」的眾多妓女，寫道：「不止可以駭然，簡直可以痛哭一場。社會組織不良，才有這樣的怪現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¹¹³再鑒於此次事件的結局，是進德會關於改良道德風化和禁娼的主張，遭到了界內外人利益集團的杯葛和阻攔，工部局也沒有多少熱情去切實大力執行，致使此次禁娼運動不了了之，上海依然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娼妓最多、道德風化最為糟糕的港口城市——孰不謂這或可被視為外人冒險家樂園的上海、乃至半殖民地的中國意義上「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

(本文於 2010 年 7 月 1 日收稿；2011 年 2 月 20 日通過刊登)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李亞琴、熊瑩、蔣寶麟在查找資料方面的幫助，沈宇冰、蘇陽楊、楊笛、童玉汝也曾幫助翻譯

¹¹¹ “Appendix B Raito of Prostitutes to Population,” 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檔號 U1-5-67；〈人口與妓女之比較〉，《時報》，1920 年 3 月 21 日，第 3 張。

¹¹² 〈革除租界妓寮之建議〉，《時報》，1920 年 3 月 19 日，第 3 張。

¹¹³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 7，〈寄新潮社諸友〉，頁 379。

了部分資料。此外，本文分別於 2008 年 2 月 14 日在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以及 2010 年 5 月 24-25 日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召開的「亞洲港口的疾病和公共衛生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報告，得到與會者的批評指教。在審查過程中，又先後得到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提出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惟文中錯誤由作者自負。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1917-19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上海檔案館館藏，《工部局檔案》。

《申報》(上海)

《時報》(上海)

The Chinese Press,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Chicago Daily Tribunes, Chicago.

Los Angeles Times, Los Angeles.

The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Millard's Review, Shanghai.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二、近人論著

黃式權，《淞南夢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鮑威爾(Powell, J. B.) 著，邢建榕等譯，《我在中國二十五年——《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回憶錄》，上海：上海書店，2010。

Bickers, Robert.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 Clifford, Nicholas Rowlan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over: Middlebury College Press, 1991.
- Gilfoyle, Timothy J. "Prostitutes in History: From Parables of Pornography to Metaphors of Modern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1 (February 1999), pp. 117-141.
- Fearn, Anne Walter M. D. *My Days of Strength: An American Woman Doctor's For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39.
- Henriot, Christian. *Prostitution in Shanghai, A Social Histor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1. 中譯本：袁燮銘、夏俊霞譯，《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Hershatter, Gail B.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20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中譯本：韓敏中、盛甯譯，《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 Hu, Cheng, "Venereal Disease Prevention, Moral Welfare and Civilized Image: The Shanghai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and the Anti-Prostitution Campaign in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18-24,"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6:2 (June, 2011), pp.242-262.
- Levine, Philippa. *Prostitution, Race, and Politics: Policing Venereal Disea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 Locke, Harvey J.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Venereal Diseas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December, 1939), p. 837.
- MacPherson, Kerrie L. "Health and Empire: Britain's National Campaign

- to Combat Venereal Disease in Shanghai,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Roger Davidson and Lesley Hall eds., *Sex, Sin, and Suffering: Venereal Disease in European Society since 187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173-190.
- Muirhead, DR. “A Jubilee Review of Missionary Work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hanghai, September 1897), p. 412.
- Pascoe, Peggy Ann. “The Search for Female Moral Authority: Protested Women and Rescue Homes in the American West, 1874-1939,” Californi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6.
- Peter, Baldwin.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Rockefeller, Nancy Moore.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the Soldiers of Democracy: Patriotism Public Health and Venereal Disease Control On the West Coast 1910-1919.” Seattl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0.
- Spongberg, Mary. *Feminizing Venereal Disease: The Body of the Prostitute in Nineteenth-Century Medical Discours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 Tsary, M. L. “The importance of venereal clinics, with a report of 400 cases from the ST. Luke’s genitourinary clinic, Shanghai,” *The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10 (Shanghai, February 1925), p.172.
- Walkowitz, Judith R. *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 Women, Clas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Woodcock, George. *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Athenum, 1969.

Prostitution Abolishment in Shanghai and the Moral Quandary of Westerners in China: The Shanghai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1918-1924

Cheng Hu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From 1918 to 1924, the Shanghai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established mainly by Western Christians and moral reformers in Shanghai's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launched an anti-vice campaign aiming at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venereal disease and ameliorating local moral welfare. They compelled the Municipal Council to declare the abolishment of prostitution within five years. Focusing on the Shanghai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Western moral reformers took the salvation of the fallen souls of the Chinese as their mission and hoped to reform China by means of preaching Christianit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Unlike the Municipal Committee or most Westerners, who limited prostitution abolishment to concerns for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order, the Shanghai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wa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orality of the foreign community and the salvation of the foreign prostitutes so as to set good moral examples for the Chinese and promote religious salvation more effectively. However, what made them embarrassed and ashamed was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many foreign patients with venereal disease and foreign prostitu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which seemed to highlight the hypocrisy of Christianit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before the Chinese, and thus became the source of moral quandary. In this sense, the Anti-Vice Campaign in Shanghai was not merely a story of modern sexual reform and Christian evangelism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 and moral reformers, but also lay at the heart of discussions that reflected the mutual moral recognition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of the local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foreign community: when talking about sexual relations, whose culture or civilization was decent and pure, and whose was wild and lascivious. Could this perhaps be regarded as “the White Man’s Burden” for Westerners who considered Shanghai the adventurers’ paradise and China their semi-colony?

Keyword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Shanghai Moral Welfare Committee, prostitution abolishment, moral quandary